

命

〔目〕 柳美里 著

YU MIRI



I313.45
LML

命

〔日〕柳美里 著
翁家慧 译



10

南海出版公司

2006 · 海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命 / [日] 柳美里著; 翁家慧译. — 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06.12

ISBN 7-5442-3588-2

I. 命… II. ①柳…②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41148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: 30-2006-083

INOCHI by YU Miri

Copyright © 2000 by YU Miri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ogakukan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YU Miri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 / Bardor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MING

命

作 者	[日] 柳美里
译 者	翁家慧
责任编辑	翟明明
特邀编辑	蒋俊岭
丛书策划	新经典文化 www.readinglife.com
装帧设计	新经典工作室·金山
内文制作	秦 华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66568511
社 址	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电子邮箱	nanhaicbgs@yahoo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开 本	890 × 1270 毫米 1/32
印 张	7.25 字 数 124 千
版 次	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442-3588-2
定 价	20.0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我在微明的晨曦中醒来。

好像不是被噩梦魔住，也不是因为睡眠太浅，更不像是因为尿急或被什么声音吵醒的。我觉察到身体里面发生了某种细微的变化，可能是身体在无意间觉察到了什么而从睡梦中醒了过来。

今天是五月二十四日。

如此说来，每年这个时候我都送生日礼物给东由多加，但今年却因小说的截稿日期迫在眉睫，我竟已将他的生日忘得一干二净了。墙上有一个留言板，上面用大头针钉着张便条，写着：五月十二日，生日礼物。

我把好多东西都钉在留言板上，比如约稿的传真、欲

购书籍的书评、感兴趣的新闻剪报，以及一些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想要的商品目录。我的整理方法就是每两三个月扔掉其中的一半，把剩下的一半收到箱子里，等到年底大扫除的时候，再把箱子里的大部分东西都清除掉。一张发黄的剪报吸引了我的视线，那是一则关于“肺癌的基因疗法”的报道，报道的日期是今年的二月二十五日。我并没有打算要写一篇关于癌症和基因的小说，怎么就剪下了这么条消息？我把手放在额头上，好像有点烧。其实，几天前就开始有点发低烧，只是截稿前经常如此，我也就没怎么放在心上。翻开记事本，我一边确认校完末校之后的日程安排，一边瞅了一眼上个月的日历。四月二十五日，来例假。那到了五月二十一日、二十二日要还不来就有点怪了，可我身上却没有一点来例假的征兆。我不禁觉得浑身发冷。

我睡到过晌，起来后就去附近的药店买了早孕试纸，回来一试，发现试纸的颜色并没有变化。我又看了一下说明书，上面写的是例假迟来一个星期以上才会有变化。我就又去了趟药店，把架子上所有的试纸都拿到收银台。我打算每天都测一遍。我确信我是怀孕了。

怎么对他说呢？也许什么都不说最好。不管是生下来，还是做人流，什么都不说最好。我有一种预感，要是真的怀孕了，我们之间也就结束了。

他是在电视台做新闻的，三十五岁，已婚。我们初次相遇时，他身上没有任何已婚男人的味道，我以为他还是个单身汉。直到我们有了关系之后，我才知道他原来已有家室。在床上的时候，我问他：“你现在有女朋友吗？”他眨了眨眼睛，说：“我和老婆正闹分居呢。”以前，我也和这种有家室的男人交往过，每次总会让对方的妻子痛苦不堪。于是，我就对他说：“咱们就到此为止吧，继续下去就会日久生情，反而更痛苦。”

然而，我们还是见面了。

我也知道我應該离开他，但越想着要离开，就越想见到他。我们几乎每天都通电话，每天都见面。有时候太忙，就只有三十分钟喝茶的时间，有时候我就哀求他：“就五分钟，什么地方都行，站着说会儿话也行。”一开始我就信了他的话，以为他和老婆已经分居。所以，我就把家里的钥匙给了他，还给他买齐了内衣、袜子、手帕、睡衣和剃须刀。他要是在我家过夜，第二天还得有换的衣服，我就想给他买一套便装和一套正装，但他对此不置可否，含糊其辞。而且，他就只穿过我给他买的睡衣，我也意识到他所谓的分居只是一个谎言。但我仍然相信他所说的，他和妻子的关系已经破裂，五年没有夫妻生活，而且，离婚申请也已经写好了。我只是一味地相信，他们不久就会离婚，然后我们俩就可以生活在一起。

我们的交往越深，我就越发不能忍受他在我和他妻子之间保持的那种绝妙的平衡。于是，我不断加大每天服用的安眠药的剂量，每日里整个人就都处于一种昏昏沉沉的状态之中，体重也下降到四十公斤左右。

他对我说：“我也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但一下子要离也离不了。”他说这句话的意思，我把它理解为，只要花上一段时间，婚还是可以离的。

枕边细语时，我天真地对他说：“我想和你生个孩子。我不会给你添负担。你要是想我们了，就一个星期一次，或一个月一次，来看看这孩子好了。”

写作计划已经排到了两年之后，那些还没有影子的作品的版税，早就被我预支了。我哪能生孩子呢？

他接着我的话编排故事：“咱们的孩子生下来之后，就想要每天都看到他，想要自己来抚养他。我觉得生活在父母健全的家庭中的孩子比较幸福。要是一个星期或一个月才能见一次面，那我肯定会疯掉的。”

这次谈话是在四月底，没想到我一个月后居然真的怀孕了，这叫我怎么说呢？

校完最后一稿，小说就可付梓了。那天，我拿出早孕试纸一试，色带变成了蓝色。我的低烧还在继续。犹豫再三，我给他打了个电话，告诉他有事情要谈，看他晚上有没有时间。他稍微有点吃惊地问道：“什么事情？”我说，

见了面再说，就把电话挂了。我们在六本木碰头，然后一起进了酒吧，四杯 salty dog 下肚，我还是没法说出口。

回到我家，两个人躺在床上时，我说：“我可能怀孕了。”

“我猜也就这事。”他说完这句话就再没吱声，那天晚上我们俩没有做爱就睡了。自我们开始交往以来，这还是第一次。

第二天，我们俩好好谈了谈。那天不是周末，但他没有去上班。

“你像现在这样保持单身不挺好吗？”

“我也拿不定主意，但我要是生下来，是不是就只能分手？”

“怀孕就分手，这也太可笑了。”

“但我们只能分手。”

“为了咱们俩考虑，还是去做人流吧。”

我想哭，就像一般的年轻女孩那样哭出来。然后，眼泪就流下来了。

他是记者，曾经采访过难民营，我一向以为，不论怎么说，他都应该算是一名自由派的人权主义者。如果他求我把孩子生下来的话，我可能就去做人流了。但是他现在的说法却让我觉得滑稽。我反问他，拿掉孩子是不是有悖于他的信条。

也许是记者的良知唤醒了，他果断地说：“我明白了。首先应该考虑孩子的生命。”

夕阳西下，房间里暗了下来，但谁也没有开灯的意思。

他背对着我，说：“我一定会想办法和她离婚的。要真是离不了，我也只能请你原谅了。可是，我也想要自己的孩子，想跟你一起把孩子养大。从今以后，我这辈子都会争取和她离婚。”

第二天，他又留下来过夜。

“既然决定要把孩子生下来，那你就不能抽烟喝酒，也不能熬夜。现在手头还有什么工作没做完？”他问我。我就把日程表拿出来，告诉他还有截稿、碰头会、会餐什么的。他说，这个还是回绝了的好。这个没问题。要是会餐实在推不了的话，就不要喝酒。他那口气简直就像个准爸爸。

六月十三日，星期天。我因为出血而住进了广尾的日本红十字会医疗中心。预定十四日在《新潮 45》杂志上和小泉纯一郎的对话访谈也只好取消了。

家里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做，稿件的传真、邮件、洗衣服、给植物浇水等等，这都得请个人来帮忙。我想把怀孕的事情告诉妹妹，叫她过来。但他却说：“现在先别告诉她，这些事情我来做好了。我现在还没脸见她，你先别

告诉她。”然后，他就一直住在我的公寓里。我开始有妊娠反应的时候，医院里的饭菜根本就难以下咽。他每天早上都会打电话过来，问我：“想吃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想吃蛋筒冰激凌。”他就会在冰激凌融化之前飞快地给我送过来。而且，医生和护士来巡诊的时候，他都表现得像丈夫一样自然。

我还是很困惑。一边着急不已，想要早点动手写和角川书店签约的长篇小说，一边又不想放弃这幸福的感觉，这是我有生以来体验到的最甜美的生活，这是一个女人孕育着她所喜欢的人的骨肉时所感到的幸福。这两种情绪深深地困扰着我。

要是在以前，每逢周六周日，他连个电话都不会打过来，但现在却每天都来医院看我。于是，我就觉得他的离婚谈判应该正在进行之中。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因为他的妻子从六月上旬就去国外出差了，有三个月时间都不在家。他从没告诉过我他妻子是干什么的，我也不想打听。篡改事实是谎言，隐瞒重要的事情也是谎言。

六月二十二日是我三十一岁的生日，也是我的处女作《石头上游泳的鱼》接受判决的日子，这部小说被起诉侵犯隐私和毁坏名誉。我担心得不到外出的许可，就一直都没有和主治大夫说起这件事。在他巡诊的时候，我鼓足勇气向他说明了情况，没想到他态度坚决地说：“就因为上

法庭，那就更不能允许你外出了。万一要再出血，怎么办？我给你开证明，你还是不要出席了。”

“我估计判决可能对我很不利，要是我把记者见面会也给取消了，就会被认为是在逃避。”

主治大夫对旁边的护士说：“那你就坐轮椅去，让护士陪着你。”

“不行，我不愿意坐着轮椅去参加记者见面会。我会坐出租车去，见面会一结束，我就打车回来。”

记者见面会那天，我好不容易撑到最后，回到医院，在病房里看电视里有关判决的报道。我的作品成了战后第一部被禁的小说。我备觉震惊，这实在是最坏的结果。不过，因流产先兆而住院的事情居然瞒过了所有人，我不禁放下心来，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。

第二天早上，他给我买了份报纸，看着上面的照片，他有些不安地说：“你这肚子都已经很明显了。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睡不着觉，把他前前后后说过的话拼凑起来一想，才明白这婚是很难离得了了。他只不过一直在编故事而已。他要是不想离，我也不打算逼他。我只想知道他真实的想法。他到底爱不爱我？是不是真的期待着我们的孩子出世？或者，他是不是在内心深处诅咒着孩子？

我想弄清楚这一切。

我觉得自己像是被卷入了滚滚洪流之中，内心感到巨大的不安。我在散文和访谈中，总是果断地说写作就是我的生命，但现在却觉得文字已没那么重要了。我只是觉得害怕，我想要个依靠。

出院前一天，他来病房的时候，我贸然对他说：“还是拿掉吧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住院？”

“一个人带孩子，我没这个自信。咱们还是分手吧。你把钥匙还给我。”

“我求求你，给我生个健康的宝宝。可能我这辈子就这一个孩子了。”

“把钥匙还给我！”

“决不！我要还给你，你就会把孩子拿掉的。”

我们俩吵了起来。

“那好，我还给你。不过你要答应我不去做人流。”他从口袋里拿出了我家的钥匙。

就在那时，不知从何处传来了新生儿的啼哭声，走廊里响起了护士们慌乱的脚步声。这哇哇的啼哭仿佛是在责备我，要给我定罪似的，又像是把我从纠缠不清的烦恼中拯救出来一样。婴儿的第一声啼哭，这悲伤、甜美而有力的声音，一直在空中回响。

我把柜子里的冬衣拿到洗衣店，然后把夏天的衣物都放进去，之后，就想起要给好久没有联系的东由多加打个电话。

东由多加是东京 Kid Brothers 音乐剧团的剧作家兼导演。说是 kid，其实对于比我小的那一代人而言，它基本上是一个不太知名的剧团。不过，在七八十年代，它却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剧团，不仅有很多铁杆观众，还在日生剧场、新宿 Koma 剧场、后乐园大帐篷、日本武道馆等地方举行过公演，甚至还到过美国和欧洲。我十六岁那年，也就是一九八四年，作为研究生加入剧团，在那儿一共待了两年。

很难解释东由多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有时候，他看起来就像怪物似的，内心非常复杂；有时候看上去又像孩子似的天真无邪，而且非常贪玩。周围的人都把他当作一个孤独、滑稽的小王国的暴君。

从十七岁开始，我和东在一起生活了十年。

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比和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生活的时间还要长，因而结下了深厚的情谊，即使在分手之后，也一直保持着联系，每个月总会打一两个电话，或见个面说说话。

我一想和他谈谈，和他商量一下生不生孩子的事情，

但到最后也没说出口，只是和平常一样，话总围着彼此最近的生活打转转。

说到最后，我正要去挂电话，东突然说：“我吃东西老是卡在脖子这儿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我一下子紧张起来，捏紧了话筒。

“一般到第二天就没事了。这次一连两个礼拜都是这样。大家都叫我去看医生，但我怎么也不想去。好吧，就这样。再见。”东用他那明快地声音向我道别，并挂了电话。

我想起发生在一九九五年二月的一件事。

我们吃晚饭的时候，东被姜烧肉片卡住，跑到盥洗室里去了。我问他：“怎么了？”他用手按着胸口，皱着眉头说：“卡在这儿了，吐出来就没事了。”

如果饭前没有听说高桥昌也的事情，我也不会这么留心。高桥是 Sezon 剧场的艺术总监，同时也是个演员兼导演。大约两三个月前，高桥考虑让我来写剧本，然后在 Sezon 剧场演出，于是我们就约在剧场下面的餐厅见面。当时，他刚刚动过食道癌的大手术。一开始老是有食物堵住喉咙，虽然觉得挺奇怪，但也没有怎么去管它。将近一年之后，就什么都吃不下了，到国立癌症中心中央医院一看，才知道是得了食道癌，而且做手术也已经晚了。但是最后，高桥还是去做了手术，而且手术还获得了奇迹般的

成功。此后，高桥在戏剧界的第一线变得更加活跃了。他常常为自己一年前没有去就诊感到追悔莫及。

那天晚上，我给高桥发了一份传真，说：“我的朋友东由多加出现了和高桥先生一样的症状，如果可以，我希望能在国立癌症中心接受诊疗，您是否愿意帮我介绍一下呢？”高桥很爽快地答应了。

然而，那个时候，我和东的关系并不稳定。其实，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已有裂痕，我们相识之时，东是剧团制片人，我则是研究生。后来我离开剧团，他还是像老师一样，继续不断地影响着我。我并不是没有感到这种威慑和束缚。渐渐地，生活逐渐变得苦闷起来。我一直都在考虑早日独立出去，却没有勇气从自己口中说出“分手”二字。取而代之的是每天买醉到次日清晨，游走于朋友和男人的房间，希望借此得到片刻的自由。

就在我和癌症中心约好了时间的前一天，我明知道该回去了，却还磨磨蹭蹭地不停地喝着酒，直到早上九点在男人的房间里醒来。约定的时间是十点，我觉得快点去应该还能赶得上，于是就匆忙穿上衣服坐上出租车飞奔而去。到公寓的时候，刚好是十点过了一点。

东坐在客厅的桌子旁看书。

“赶紧收拾啊！”我气喘吁吁地说。

“你以为现在是几点呢！都这时候了，还去什么呀！”

东冷冷地说，眼睛一直盯着他的书。

我知道是我不对，也没什么可反驳的，而且也没法再求高桥先生帮忙，就只好算了。

就这样过了五个月，有一天，我搬出了公寓，开始了独居的生活。

为什么前一天晚上没有回去呢？现在我也想不明白。是我太轻率，觉得那不是癌？还是在无意识之中害怕被确诊是癌的话就一辈子都无法离开他了？或者是故意惹他生气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分手了？但是，那种对于“就怕万一”的恐惧，就像癌细胞一样，开始在我的心底深处蔓延。

我放下电话，感到茫然。不过，意识的深处，我确信，他这次一定是得了食道癌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给他打电话，问他：“你想不想看伊力·卡赞的《自传》，分上下册，有点长，不过很有意思。”最后，我们约好下午四点他来我的公寓。

我真是有点难以启齿，不知道怎样才能开个头，让他去医院接受检查。我们说着一些平常的话题，眼看就要到六点了。我拿出几份外卖的菜单，最后决定吃中餐，便向饭店订了炒饭、什锦汤和烧麦。

不一会儿，外卖就送到了。

东一边说“吃的时候多嚼一会儿，就没事”，一边吃了口炒饭。他吃到第三口的时候，呜地呻吟了一声，然后胡乱地抽着桌上的餐巾纸，把嘴里的东西吐了出来。接着就低垂着脑袋，很痛苦地等待着块状的食物滑过他的食道。

“我总是忘了多嚼一会儿再咽下去。”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还冲我露出了一张笑脸。

“去医院看看吧。”我站起来说。

“我会去的。可今天是星期六啊。”

“挂急诊就行，反正到日赤，走路也就五分钟。”

我只想着怎么把东带到医院去。我给日本红十字会医疗中心打了个电话，确认可以就诊。

我们默默地穿过日赤的大门，走向急诊接待处。

叫到东的名字后，他就进了门诊部。

门诊部前面的长椅上有几个人在排队，一个是抱着婴儿的母亲，一个是拄着拐杖的年轻男子，还有三个男女像是来自中南美洲。这里丝毫没有急诊病区的紧张感，倒是地方火车站的夜间候车室。就在我迷迷糊糊地注视着他们的时候，东从门诊出来了，对我说了句“拍X光片”之后就从我跟前走过，穿过走廊消失在尽头。不到十分钟，东拿着X光片的袋子，又一次进了门诊室，大约五分钟后，他出来了。